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
1650—1785

【美】孟德卫著 潘琳译 张西平审校

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美】孟德卫著

潘琳译

张西平审校

灵与肉：
山东的天主教，

1650—1785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大象出版社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D. E. Mungello

1999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美)孟德卫
(Mungello, D. E.)著;潘琳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 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 - 7 - 5347 - 5174 - 5

I. 灵… II. ①孟… ②潘… III. 罗马公教—基督教史—山东省—1650—1785 IV. 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382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

作 者 [美]孟德卫

译 者 潘 琳

审 校 张西平

责任编辑 王莉娜

责任校对 石更新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编 于沛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昇 徐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寅

出馬上率舉一盞表示支持，這就是當時的「賀喜」。在世宗朝時，乾隆皇帝對大學士高宗的「賀喜」非常厭惡，竟說：「朕從來不賀喜！」

總序
步容：編纂清史工程，是繼《資治通鑑》之後，又一項浩大的工程。它將以全新的視角，重新評述中國歷史，為後人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了解中國歷史。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

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

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 年 5 月

清史纂修与汉学研究——清代传教士著作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十五”期间重点图书项目之一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之三 清代传教士著作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十五”期间重点图书项目之一 清史纂修与汉学研究“十五”期间重点图书项目之一 **出版说明**

总主编

任继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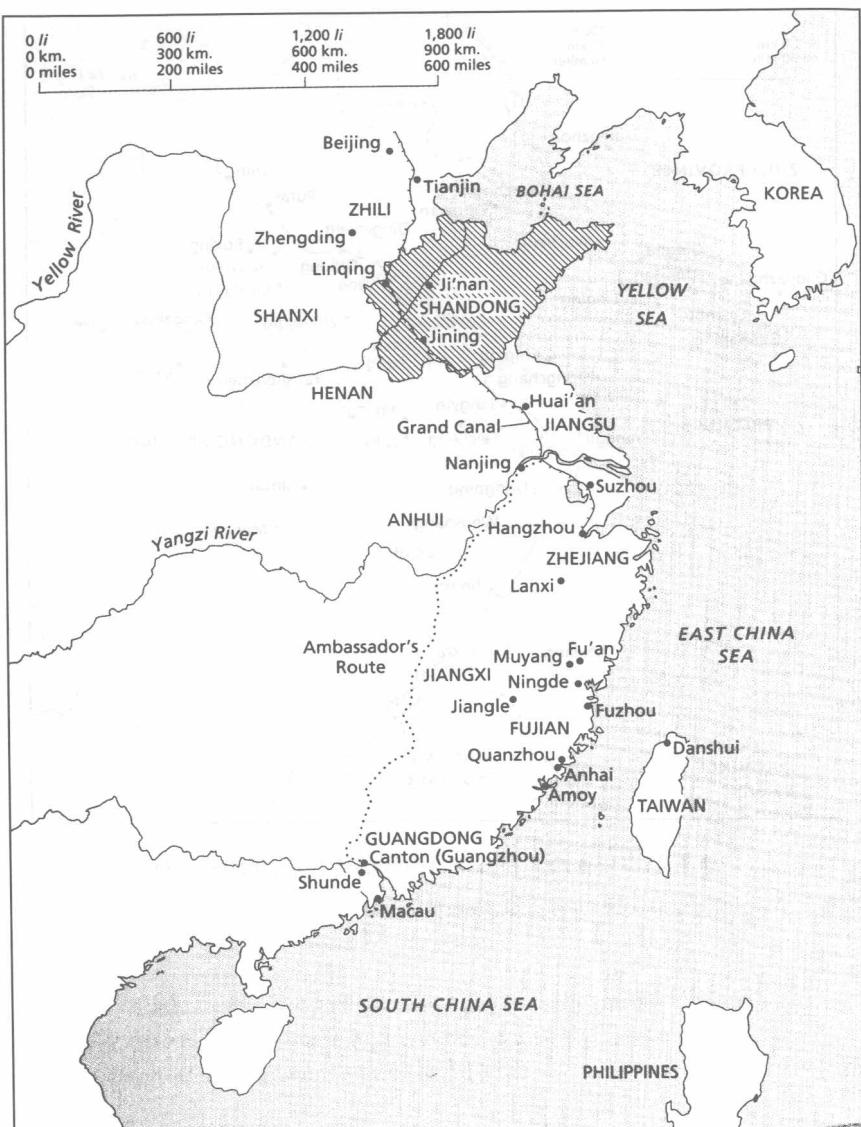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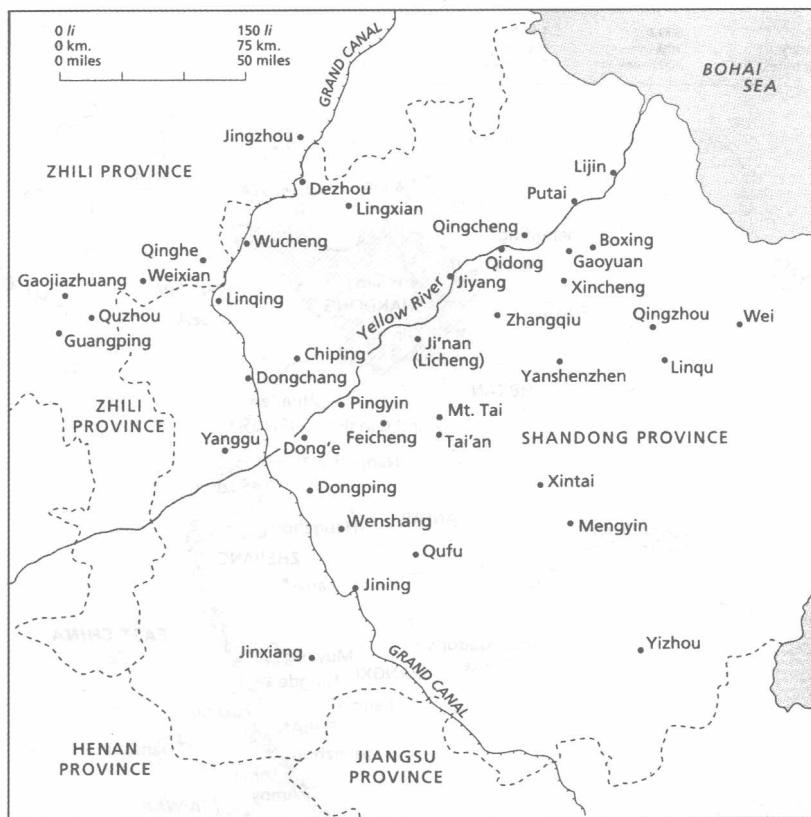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4年6月



地图 1：中国东部, 山东的地理位置, 1650—1785



地图 2: 山东省西部和直隶省南部的传教点, 1650—1785

泰山文史资料上编(1949—1957)、中编(1958—1976)、下编(1977—1997)、新编(1998—2007)、典藏本(1949—2007)、泰山文史资料(1949—2007)、泰山文史典藏(1949—2007)

序 言

方济各来华传教史：清代天主教史 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西平

清初以来，西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于 1579 年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位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他在中国传教 24 年，于 1581 年在南京殉道，享年仅 33 岁。他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建立教会，培养人才，著述甚丰，对中国天主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清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来取得较大的进展，研究著作和翻译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加深了我们以往的清代的天主教史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但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著作和译著仍是集中在对来华耶稣会的研究，对天主教的其他来华修会的研究相对要薄弱些。国内学者汤开建首先发表了研究论文《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华的传教》^①，崔维孝 2006 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研究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史的著作《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23)》，从而开辟了清代来华传教史研究的新领域。孟德卫先生的这本《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则是国内所翻译的第一本西方汉学界关于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研究的著作，这部著作对于清史研究和清代的宗教史研究都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对清史研究来看，书中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材料，使我们可以从中西文献的对应中加深对清代一些历史事实的认识。

在这本书中记载了康熙在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和 1703 年

^① 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16—258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康熙四十二年)及 1707 年(康熙四十六年)三次南巡时会见在山东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的情况。其中康熙在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1 月见柯若瑟在中文文献《熙朝定案》中也有记载:“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圣驾至山东济南府。早晨,远西修士柯若瑟乘马出城十里,跪迎道左。万岁在马上远见西洋面貌,龙颜喜悦,即令近前,臣柯不敢骤然近御前,蒙命驾前,大人将柯左手携送,切近驾前,皇上驻跸,御手亲执臣柯左手,谕:‘近来些,问你姓甚么?’柯奏云:‘臣姓柯,名若瑟。’又问:‘你几时到中国?’奏云:‘进来两年。’又问:‘可曾到京么?’奏云:‘未曾进京,臣不晓得天文,才在这里学话。’即谕云:‘你回堂。’御手才放臣柯手臂。当时侍卫赵云:‘先生回堂,我随后来。’柯若瑟即尊旨回堂,随备土仪六种。……遂邀二位大人进厅叙话待茶……”^②赵昌到教堂后和柯若瑟谈了什么,中文没有详说,在孟德卫的书中则具体介绍了他们谈话的内容。书中说:“两人问了柯若瑟许多事情。一开始,他们沿着皇帝曾经问过的问题往下进行。他们问柯若瑟何时到达中国,通过什么方法来的。柯若瑟回答,他两年前到达中国,那时闵明我神父(Father P. Grimaldi)离开北京,于 1686 年 9 月或是 11 月回到暹罗和欧洲。对于有没有拜访过中国其他传教士的问题,柯若瑟回答他还没有拜访过北京的传教士,但去见过住在南京的耶稣会士毕嘉神父(Father Ioannes Dominicus Gabiani, S. J.)。他们还问了许多关于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及当时它与奥匈帝国的冲突。他们问柯若瑟是哪国人,神父回答说是西班牙,与北京名誉卓著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毕日升可以算是同乡,都来自伊比利亚半岛。”1703 年康熙第四次南巡时郭纳璧(Bernardo de la Encarnacion)见到康熙和康熙与南怀德(Miguel Fernández Oliver)的谈话在中文文献中没有记载。书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皇帝看到南怀德时,他让轿夫停下御轿,问他为什么没有跟另外一个欧洲人法安多在一起。然后康熙皇帝还问了一些程式化的问题:从哪个国家来,

^②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第 171 页,中华书局,2006 年。

多大年纪，在中国呆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没有去北京的朝廷，以及是谁阻止他前往北京。南怀德意识到了皇帝话中有玄机，回答的时候用词谨慎。他说没有人阻止他，只是他自己在数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才能欠缺，不能为朝廷效力，因此才没有去。皇帝问他是否跟南怀仁(Verbiest)神父有亲戚关系，因为他们的中文名字相近，南怀德回答说除了来自于同一个国家，他们并没有其他关系。然后皇帝问他为什么没有和法安多一起去迎接他。当南怀德回答说，他们分属不同的教堂，法安多跟他的教众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时，皇帝大笑起来，对随从夸赞他‘伶俐，伶俐’”。通过中西文献的相互印证，可以看出当时康熙对传教士很有好感，很渴望得到那些有西方科学技能的传教士。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2006年在中国也出版一本关于方济各在华传教史的书籍，这就是崔维孝的《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23)》。两本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崔维孝的书是全面论述方济各会从1579年到1723年的在华传教历史，而孟德卫的书则主要集中在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的历史。崔维孝的书表现出了中国学者对中文文献熟悉的特点，作者使用了近年来刚刚出版的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暨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书，书中有不少关于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的历史文献档案，十分珍贵。例如，康熙四年(1665)《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复审理利安当等五名西洋人传教案本》中有利安当的供词。“利安当供称：我于崇祯七年独自从西洋来至广东香山澳，顺治八年在山东济南府购房建堂居住，从未结火。我非汤若望带来，亦不认识汤若望。我传布天主教属实。等语。”^③崔维孝对这份档案从中文和外文两个方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暨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22号档49—5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面进行的分析，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④ 另外，书中对利安当的《临丧出殡仪式》和《丧葬仪式》的研究也很有特点，这些在孟书中都没有。但孟德卫的研究也很有特点，这本书相比较于崔维孝的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传教士传教的细节介绍得十分详细。例如，作者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 1659 年在济南的基督徒的圣诞节是如何度过的。他认为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三个礼拜以前他们就开始准备供品，并且进行忏悔，先是妇女，然后是男人们，最后领取圣餐。圣诞节前夜，信徒们纷纷从济南周边的小镇来到东教堂。利安当从傍晚开始到深夜一直在隔壁的一间小房间里听取信徒的忏悔，教堂里则挤满了人，信徒们唱着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赞美诗，齐声做着祷告，先是玫瑰经，然后又是十五谛的连祷文。忏悔结束之后，利安当做了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布道和弥撒，然后给之前没有领过的信徒分发了圣餐。凌晨 4 点，文都辣 (Father Ibanez, 1610—1691) 神父做了 3 次弥撒。早晨时利安当又为那些来迟的人以及在教堂过夜的信徒做了两次弥撒。最后，教区信徒们结伴回家了。同时，耶稣会济南西教堂的汪儒望 (Valat) 神父也赶了 20 里格的路与基督徒们共度佳节，信徒们吹奏着笛子和其他各种乐器，点燃了蜡烛，欢天喜地地庆祝节日”。这些描写使我们对清代基督徒的宗教生活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

第二，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特点。作者认为：“基督教早期在中国的发展常常被认为是由罗马教廷或北京朝廷所决定的事件，但如果仔细研究基督教在像山东这样一个省份的最初发展时，就会发现地区性和本土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当时的山东不少基督徒就是白莲社的成员。作者说：“不仅基督

^④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23）》，第 125—126 页，中华书局，2006 年。参阅汤开建《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华的传教》，见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29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教和白莲社的教徒很多来自相同的阶层，有些官员还怀疑某些人同时是两教的成员。1719年9月，山东巡抚向南怀德抱怨说，有一个叫孟尔雅的秀才被康和子任命为教义问答师，但他实际上是白莲社的成员。”当时白莲社受到清政府的围剿，这样，白莲社的成员就以天主教作为自己的掩护身份。作者说：“在1718年写给耶稣会副区长纪理安的信中，南怀德说许多异教徒决定受洗，以此来获得基督教的庇护，洗脱身为非法秘密教团成员的罪名。但是南怀德和方记金(Franchi)都拒绝让他们入教，因此他们去了济宁，欺骗卞述济神父为‘数千人施洗’。他们找了一些玫瑰经念珠、十字架(圣号)和瞻礼单放在自家大门上，用来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以此寻求庇护，但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是如此贫乏，甚至常常把标记挂错。”孟德卫这个研究给我们展现了当时清代社会的复杂局面和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这些，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本土的特点。

第三，传教士在传教中的灵与肉的冲突。孟德卫教授这本书最有特点的研究是他揭示出了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个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没有很适合的仆人，饮食上的不习惯等。如书中所说：“没有人给神父们照料三餐，虽然他们花了许多时间教那些仆人，但还是无法做出适口的饭菜。更为糟糕的是，令传教士们感到不满的是中国菜的烹调方式，而不是厨师的手艺问题。中国仆人抗拒传教士们所教的烹调方式，在其他家务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这些西班牙传教士忍无可忍地咆哮时，仆人们常常嘟囔，甚至有时说一些对基督教不敬的话。利安当抱怨不能用鞭子来管教他们，怕会引来谣言和对传教的反感。”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一些传教士在传教中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两名传信会传教士，贝维拉瓜(Bevilacqua)和兰达尼尼(Randanini)神父的丑闻和悲剧。他们从1736年至1741年在山东西部和直隶南部进行传教工作，“贝维拉瓜是一个‘放荡的卡拉布里亚人，性行为的爱好者，在中国基督徒当中组成了自己的后宫’(calabrese scostumato, affetto da priapismo e che s'era fra le cristiane cinesi costituito un har-

em）。贝维拉瓜利用自己的教士职权引诱中国基督徒中的熟人和忏悔者，其中有已婚妇女也有未婚女孩。在他所工作的乡镇，贝维拉瓜试图说服这些女人，她们并没有罪，而是对于急需者的慈善行为。贝维拉瓜的性伙伴可能也包括男性”。这个贝维拉瓜“魔鬼欺骗了许多少女和少妇，玷污了她们的身体。”而兰达尼尼在一名小厮的陪同下去市场试图用金钱向一名非教徒妇女求欢。当时，这名妇女既愤怒又震惊。此事一度闹得很大，后来教区主事老苏(Su Lorenzo)用钱把这件事情压了下去。

这样的研究过去在中文学术文献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孟德卫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这两本书都属于传教学的范围，这两本书的研究说明在中国对传教士在华活动做一种传教学的研究并未过时，因为在明清之际，中国教会的主导权在传教士手中，如果不做传教学的研究，你就无法把握住当时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全貌。正如汤开建先生所说：“早些年的欧洲汉学家都喜欢谈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问题，国内亦有不少学者跟进。在他们的视野中，似乎基督教教会史及传教史的研究已经过时，或者说教会史及传教史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研究，甚至将传教史、教会史的研究完全归于一种‘欧洲中心观’的产物。我很不赞成这些将事情叙述复杂化而结论上又是十分简单的理论分类。”^⑤笔者完全赞成这样的观点，可以这样说，由外国学者主导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汉学家们可以提出他们的模式，中国学者则同样可以对他们的这种模式谈自己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事。孟教授的这本书也说明，在西方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中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着“范式转换”论者跑的，这本书的出版也给我们展现出在欧美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的多样性。

^⑤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23)》序，第11页，中华书局，2006年。